Global
Cases & Practic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RTICLE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落地与实践矛盾优化研究 —— 基于五所职业院校的考察分析

作者

刘畅 冯慧媛 黄妍 胡奕婷

通讯作者

冯慧媛 Email: 3299234324@qq.com

收稿：2026年4月21日

评审：2026年6月10日

接受：2026年7月10日

发表：2026年7月25日

引用

刘畅，冯慧媛，黄妍，胡奕婷. (2025). 制度—文化双轮驱动：德国双元制企业参与经验与我国现代学徒制优化路径研究. *全球职业教育案例与实践*, 02(01). 42-59.

DOI: http://doi.org/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落地与实践矛盾优化研究 —— 基于五所职业院校的考察分析

刘畅[a], 冯慧媛[a], 黄妍[a], 胡奕婷[a]
[a] 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制度载体，但其政策落地与实践运行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本研究通过梳理2005年以来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阶段政策演进历程，结合对广西、广东五所中高职职业院校的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系统剖析政策落地中的核心矛盾。研究发现：顶层普惠育人政策与基层精英化备赛形成结构性冲突；统一竞技规则与中高职分层发展的适配性不足；赛教融合导向下成果转化机制薄弱；综合育人评价要求与赛事实操评价的导向存在偏差。针对上述矛盾，从重构普惠育人体系、优化赛制规则设计、深化产赛教融合机制、完善综合评价体系四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旨在推动世校赛从“赛事竞技”向“育人赋能”转型，实现政策价值与实践成效的深度统一。

关键词：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落地；实践矛盾

1. 引言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世界技能大赛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制度载体。相关研究首先聚焦于赛项标准的变化及其对我国职教体系的影响，指出赛事标准具有岗位真实性、过程导向和动态更新等特征，能够反映产业技术迭代趋势，并为课程标准重构提供参照（刘东菊，2012；刘东菊&王晓辉，2013；李杰，郭达，张瑞&陈晓曦，2018）。进一步地，有研究强调，赛事技术文件不仅规定操作程序，还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强化质量控制、效率意识与安全规范，体现出由“结果评价”向“能力评价”的转向（李杰，郭达，张瑞&陈晓曦，2018；周衍安，2021）。

围绕政策落地与实践转化，学界形成的共识是：赛事标准对职业院校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但其进入常态教学仍存在适配问题。一方面，赛事导向有助于倒逼专业教学改革、提升技能训练质量和职业素质水平（刘东菊，201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提醒，若过度强调竞赛成绩，容易形成竞赛至上的功利化导向（张宏亮，2011）。这说明，直接引入世界级竞赛标准，也难以自动转化为学校层面的教学改进，其落地效果会受到专业结构、教师能力、训练资源和管理机制等多重因素制约。

在制度优化路径上，研究逐步从“如何参赛”转向“如何育人”。李静波指出，新时代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不再局限于单一技能比拼，转向综合育人导向，在赛制不断创新的同时，注重团队协作与职业素养的协同考察。（李静波，申培轩&耿洁，2025）。张俊勇则从职业教育整体发展角度指出，世界技能大赛能够从外部推动职业院校优化专业建设、提升师资水平、改进人才培养模式，而赛事发挥长效作用的核心，在于将竞赛理念、训练经验转化为常态化的教学内容与实训模式（张俊勇&张玉梅，2018）。因此，现有研究已经为“政策—学校—课堂”链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对不同类型职业院校在政策承接、资源配置和实践执行中的差异性讨论仍不充分。

基于此，本研究以五所职业院校为样本，重点考察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在学校层面的落地过程及其现实矛盾，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与补充价值。现有文献更多从标准、赛制和理念层面展开，对政策如何在不同学校中被解释、转化和执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本研究揭示政策落地中的偏差来源，并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

2. 政策梳理

职业教育领域关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制度建立阶段、国际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初步探索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建立国内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体系；在制度建立阶段，政策逐步明确了竞赛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在国际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着重于构建国际赛事平台，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2.1 初步探索阶段（2005—2010年）：从试验区探索到国赛常态化

2005年8月19日，全国首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落户天津。随后，天津市政府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提出：“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积极参与。”这是将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首次写进政策议程（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6）。2007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从2008年起，每年5月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等共同在天津举办“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这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7）。2008年，

教育部正式印发《关于举办200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这是大赛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文件，也是决策结果向全系统传达的正式公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同年6月，首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正式开幕。在开幕式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要通过定期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的局面（周济，2008）。周济的这一讲话，标志着大赛制度从政策文本走向社会共识，也确立了其与高考并行的制度地位。

早在2002年和2007年，长春、重庆等地就曾尝试过举办大赛，但这些大赛仅是依附于会展活动的配套活动，并非独立的国家级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而且这些赛事，仅限中职生参加，规模小、覆盖面窄，影响力有限。但是自2008年起，大赛通过独立设赛、纳入高职、国家部委联办、固定周期地点与经费，将大赛制度化、国家化，成为“职教高考”式的常设品牌赛事。

地方层面的政策在初步探索阶段已经开始建立。200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举办200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与国赛有关的政策文件较少，主要以转发该通知、组队参赛为主，核心是落实首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参赛工作。以深圳市为例，2008年深圳市教育局，计划单列市单独组队参赛（深圳市教育局，2008）。

在此阶段，核心成就是完成了大赛制度从“构想”到“落地”的全过程。政策工具以“行政动员”为主，通过高层会议决策、年度工作要点部署、正式通知发布等递进式文件体系，确立了大赛的制度合法性。“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话语建构，为大赛赋予了与高考比肩的象征地位，成为后续政策深化的话语基础。

2.2 制度建立阶段（2011—2018年）：三级竞赛网络的形成与制度深化

2011年，为了充分发挥地方产业和职教资源优势，教育部决定将部分赛项安排在江苏、山东两个分赛区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1），这一举动为2012年正式启动分赛区的实践探索奠定了基础。到2012年，全国分赛区数量增加至十个，形成了“多点办赛、全国联动”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

2013年，教育部出台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2013-2015年）》，首次以三年专项规划形式对大赛体系构建、赛事制度、赛项设置、参赛资格及分赛区建设作出系统顶层设计，明确高职、中职参赛年龄限制、获奖比例及赛项总量控制等刚性要求，为大赛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2018年，教育部等37部门联合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这是第一部国家级大赛章程、大赛的根本性文件。该章程取消了“天津主赛区”，此前2019年之前天津一直作为大赛主赛区，此后大赛逐步走向全国化，真正形成了“办赛

在全国、受益在全国”的局面；固化校赛—省赛—国赛三级竞赛链，明确“校校有比赛、省省有竞赛、层层有选拔”（教育部等37部门，2018）。需注意的是，2021年教育部等35部门联合印发了新修订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2018年印发的版本随之作废。

制度建立阶段的核心成就是完成了大赛从“单一赛事”到“三级体系”的制度化转型。2018年章程的出台为大赛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框架，明确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核心宗旨。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开始涌现，各地的实践表明，竞赛已成为撬动区域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杠杆。

2.3 国际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 - 至今）：接轨国际，聚焦育人与成果转化

2020年，大赛开启“试点赛”改革，在办赛机制、申办主体、经费投入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教育部强调要“建立以地方政府背书、职业院校为主体的申办机制”，遴选40个赛项开展大赛试点工作，以期通过试点，明确各方职责，强化职业院校办赛主体作用，完善制度体系，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在2022年大赛赛事组织过程中，山东赛区投入1200万元、广东赛区投入800万元、甘肃赛区投入718万元、青海赛区投入598万元等专项经费，保障了赛项顺利举办，充分体现了新模式的有效性（曾天山，房风文，陈宏辉&刘晓辉，2024）。地方政府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投入”，折射出竞赛政策与地方发展需求之间的激励机制正在形成。

2024年是中国职业技能竞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正式升级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这一升级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意味着赛事定位、标准、功能的全方位重构。

2025年，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大赛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构建涵盖专家管理、赛事管理、资源共享的一体化平台（安徽省教育厅，2025）。湖北省则提出了“推荐队+抽测队”的组队模式——既有学校自主推荐的“精英队”，也有随机抽取产生的“抽测队”，这一创新意在防止“为赛而赛”的精英化偏向，确保竞赛能够带动全体学生而非少数“参赛专业户”（湖北省教育厅，2025）。

高质量发展期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竞赛成果的转化问题。2026年4月，广东省出台了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世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出，要走“政府引导、基地支撑、院校主体”的路子，推动竞赛标准向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向实训方法、竞赛场地向实训场地进行转化，标志着竞赛政策的重心从“办赛”转向“用赛”。（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6）。

国际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成就是完成了大赛从“国内赛”到“世界赛”、从“技

能比武”到“综合育人”的全面升级。2026年的政策重点关注“成果转化”问题，如何将“金牌标准”转化为“普遍质量”，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命题。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迭代升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经从天津试验区的构想，成长为覆盖全球的赛事品牌，成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支撑产业技能升级、促进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核心平台。这三个阶段的政策演进，既体现了国家对职业教育技能培养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也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从跟随发展到主动引领的发展轨迹，更为下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竞赛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发展的现实困境

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在2026年4月1日至4月3日，对广西柳州以及广州职业院校进行实地调研，其中共访谈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在校师生共计15人。主要围绕师生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现状、获奖状况等几个问题展开。对受访者进行编码，其中学生10人（A），教师5人（B）。结合访谈结果与参与式观察，总结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目前所存在的四点困境。

序号	院校编码	日期	地区	人物及职务	人员代码
1	ZA	2026.3.31	广东	咖啡班一年级学生	A1
2	ZA	2026.3.31	广东	中餐烹饪系主任	B1
3	ZA	2026.4.1	广西	酒店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	A2
4	ZB	2026.4.1	广西	旅游与康养学院院长	B2
5	GA	2026.4.2	广西	中西面点专业学生	A3
6	GB	2026.4.2	广西	学校副校长	B3

表1 访谈者信息

3.1 中高职同台竞技：中职院校存在天然劣势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行初赛、复赛、总决赛三级赛制，其中初赛由各院校组织，复赛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总决赛进一步划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冠军总决赛三个阶段，争夺赛在28 个国内赛区和 4 个海外赛区同步开展，排位赛与冠军总决赛均在天津举办。赛事采用逐层晋

级模式，既拓宽了参赛覆盖面，也增强了赛事的竞技性与观赏性（李静波，2026）。按照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最新赛事规则，排位赛取消分赛道界限（仍保留中高职分组），冠军总决赛初评及现场环节取消中高职分组限制、不区分赛道，这就意味着总决赛阶段实现中高职同台竞技、统一评审标准，不再按办学层次分开评比。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在中高职一体化的导向下，高职学生完成了中等职业院校的学习，具备一定的技术技能素养，同时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也使其对于知识和技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能够挖掘技能背后的理论深度和深刻内涵。因此相较于高职学生，中职学生在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体系深度等方面存在短板。“我们会把大纲、比赛方案、计划书都写好，帮学生设计一个比赛的主题，可能是与文化相关或者地区特色相关的。学生通过练习把比赛整个流程完整熟悉的走下来就行”（B2）。广西一所中职院校的老师表示，在比赛前期一些更为专业的设计上，几乎不由学生参与，均由带赛教师完成。这不仅是因为学生缺乏参赛的经历，更深层原因在于学生缺乏知识以及文化的储备和积累。在经费和技能支持上，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加，国家对于高等职业院校的经费投入高于中等职业院校。即使是在省或市级项目的支持下，相较于高等职业院校，中职院校在实训经费、设备与资源投入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省级赛事晋级后，面对更强竞争对手，多数中职选手止步国赛争夺赛，难以冲击更高赛事奖项，从而使得赛事竞技的分层公平性与规则合理性亟待优化。

3.2 成果和资源转化薄弱：校企合作深度化缺失

在赛事成果上，缺乏将比赛成果反哺于企业、运用于实际。赛事获奖成果是否仅仅是纸上谈兵的一纸方案，而无法转化为能够真正惠及企业及市场运作，能够切实吸引消费者提升满意度的有效实践。职业技能大赛，由“职业”和“技能”构成，比赛过程及结果需要以有利于未来职业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学生技能为出发点。在企业的帮助和支持下实现技能来源于企业，反哺于企业。在大赛资源转化上，存在与课程教学实践、以及主体共享的局限。大赛要点中所要求的与岗位能力相关的技术和职业素养还尚未完全体现在教学中（徐梓榆&吴书龙，2025）。将大赛的要点和知识点融入日常的教学环节中还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执行力度也有所欠缺。此外，大赛的资源转化也主要集中在校内，还尚未实现成果与资源的双方共享。这一主要原因在于校企合作的深度化与协同效能参差不齐。在合作内容上，企业参与备赛指导、人才培养的深度不足，资源投入意愿有限。“我们会有一些摆盘相关的比赛，是广东省的比赛，不是职业技能大赛，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平时上课的内容，然后由上课的老师带我们训练”（A1）。“但是训练和上课还是很不一样的，老师会把一个一个步骤掰开揉碎了教学，我们穿的服装用的设备也和上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A2）。从访谈中得知，比赛训练模式和上课模式存在差别，除了教学内容以外，教学模式和教学设备均未实现共享。“他们收获最多的就是拥有了大赛的经验，以及那些技能更加熟练

和精细了。不过具体的转化要看他们未来的职场要求了”（B1）。受访老师表示，很多旅游相关的比赛以基础技能为主。在合作形式上，由于双方利益诉求差异，企业往往以盈利为目的，而职业院校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责任，教育的长期性与企业追求的盈利性相悖，从而使得双方深度的长效合作机制缺失，大多数合作停留在挂牌共建，浅层交流层面，导致真正所需的设备供给、技术指导、岗位实践等关键环节衔接不畅，直接影响备赛质量与竞赛成绩。

3.3 实践应用价值导向弱化：评价体系亟待完善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核心在于搭建起“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桥梁。赛事不仅是学校教学课程改革，专业人才培养的“导向标”，更是行业前沿与实践热点的抓手（吴少森&徐燕铭，2026）。赛事发展出现了一个突出矛盾：职业技能竞赛的先进性与行业职业资格标准的适用性存在明显脱节。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评分标准由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创新创意五项核心要素组成；其中技能水占比60%，其余评分要素各占10%（区崎云，2026）。在这五项核心要素框架下，将评价细化为15个观测点，每个观测点均有明确的内涵和分值，使评分标准更加清晰，进一步增强了评价（尤其是“职业素养”等）的客观性和操作性；同时，为克服部分项目存在的“重讲解、轻操作”现象，明确“技能水平”权重占 60分，“现场讲解效果”仅占5分，有力引导大赛回归技能核心，进一步强化了技能考查（李静波，2026）。虽然经过改革之后，大赛评价由“重技能”向“德技并修转变”，大比例侧重对“技能水平”的评价，同时兼顾学生未来的职业素养符合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职业”与“技能”的要求。但值得关注的是，应用价值这一要素评估参赛项目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区崎云，2026），反映了项目的实际应用潜力和社会影响；其中实用性这一项评估参赛项目是否针对具体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否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国家战略需求，是否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提升职业行动能力和职业迁移能力（区崎云，2026）。但应用价值这一要素占比也仅占10%，这就容易导致获奖作品可能更偏重舞台展示效果，忽视技术方案的落地性与现实应用价值。因此，需进一步细化项目成果落地应用的评判细则与考核标准，避免评分环节主观化，或是出现评价标准与产业现实脱节的问题。

3.4 比赛公平性局限：与“普惠性”相悖

当前备赛模式存在明显的“精英化”的特征。为在大赛中取得更好成绩，需要确保最优秀的师资和最先进的设备向少数学生集中，经过长时间的备赛、集中训练以及不断打磨，从而形成“尖兵作战”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赛“覆盖面小”，无法面向所有学生，从而违背了学校教育的“普惠性”特征。此外，由于资金的限制以及学生学习水平与能力参差不齐，学校用于备

赛的设施设备以及教学用具，难以面向所有学生开放。“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学生一般不参赛，选拔主要面向三年级学生”（A3）。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参赛学生范围通常缩小到一个年级。“学校先会组织一支十人左右的集训队伍，队伍里的学生都是各班前几名，最后再选出最优秀的人去参加比赛”（B3）。受访的教师表示，能进入集训队的都是各班十分优秀的学生，但出于经费和获奖要求的考虑，不得不砍掉剩下的学生。因此赛事选拔竞争激烈，且存在公平性欠缺的问题，选拔往往不考量学生的个人兴趣，而是以能否为学校斩获奖项为核心导向。

4. 核心矛盾及优化路径

结合前文政策演进梳理与五所职业院校实地调研结果可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完成从国内赛事到国际赛事的升级转型后，政策顶层设计确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支持、社会参与的办赛机制，同时坚持育人为本、成果转化的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但在基层院校落地实践中，政策文本的理想目标与教学实操、赛事运行、人才培养现实之间形成多重结构性矛盾，原有制度体系、运行模式、资源配置、评价机制未能适配世校赛国际化、产业化、普惠化的全新定位。基于调研访谈数据与现有核心研究成果，系统拆解政策落地的四大核心矛盾，结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与赛事改革趋势，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优化路径，破解“政策空转”、“赛教脱节”、“精英竞赛”等现实难题，推动世校赛从“赛事比拼”真正转向“育人赋能”，实现政策价值与实践成效的深度统一。

4.1 政策落地与实践运行的核心矛盾解构

4.1.1 顶层普惠育人政策与基层精英备赛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世校赛顶层政策明确确立“全员育人、普惠赋能”的核心宗旨，2021年修订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均明确提出破除赛事精英化壁垒，构建“校校有比赛、人人可参与”的竞赛育人体系，要求赛事资源全面对接日常教学，覆盖全体职业院校学生（教育部等35部门，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2025年湖北等地的地方政策创新，更是通过“推荐队+抽测队”模式、校级全员竞赛平台建设（湖北省教育厅，2025），进一步落实赛事普惠性要求，规避“为赛育人、只为精英育人”的误区。从政策设计逻辑来看，世校赛的核心价值在于以赛事标准倒逼全域教学改革，实现全体学生技能素养的整体提升，而非少数学生的竞技比拼。

但从五所调研院校的实践现状来看，基层院校普遍存在“重奖牌、轻育人”的功利化倾向，形成了与普惠政策相悖的精英化备赛模式，这也是当前政策落地最核心的矛盾之一。调研访谈显示，各院校均采用“层层筛选、集中集训、尖子突围”的参赛模式，优先选拔三年级成绩优异学

生组建集训队，再从十余人集训队伍中筛选优秀选手参赛，低年级学生、普通水平学生基本被排除在赛事备赛体系之外（A3、B3）。为保障赛事获奖率，院校将优质师资、专项经费、高端实训设备等核心资源全部向参赛尖子生倾斜，形成“少数人享用优质竞赛资源、多数人参与常规教学”的资源割裂格局。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世校赛的普惠育人政策落空，赛事资源无法辐射全体学生，赛事改革的育人价值被窄化为“奖牌政绩”。

深层来看，该矛盾的根源在于政策考核导向与院校发展诉求的错位。顶层政策以“教学改革、全员育人、产业赋能”为考核核心，而基层院校的办学评价、品牌建设、资源争取等仍与赛事获奖数量直接挂钩。在政绩导向与资源竞争的双重驱动下，院校不得不优先保障竞赛成绩，牺牲赛事的普惠育人属性，最终形成“政策倡导普惠、实践深耕精英”的结构性割裂，严重制约世校赛育人价值的全面释放。

4.1.2 统一竞技赛事规则与中高职分层发展的适配矛盾

结合 2025 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制改革，冠军总决赛（含初评环节）取消中职、高职分组限制，所有晋级队伍同台竞技，并沿用统一的五维评价体系开展评分。该赛制优化进一步提升了赛事观赏性与评价公平性，也是大赛推进内涵升级、完善赛事体系的重要举措（李静波，2026）。从政策初衷来看，统一竞技标准旨在打破学段壁垒，倒逼中高职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推动职业教育技能标准的规范化、国际化发展。

但在基层实践中，统一竞技规则与中高职分层办学、差异化育人的现实需求形成强烈冲突，导致中职院校陷入天然竞技劣势，赛事分层公平性缺失。从人才培养体系来看，高职学生经过中高职贯通培养，具备更为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扎实的技能储备和综合素养，能够精准理解赛事标准、完成创新性赛事设计与实操任务。而中职学生以基础技能实操学习为主，理论储备薄弱、创新思维不足、赛事经验匮乏，在同台竞技中难以匹配统一的高阶赛事标准。调研中中职院校教师坦言，赛事前期的方案设计、主题策划、创新优化等核心工作均由教师全权完成，学生仅能完成基础实操训练，无法参与赛事核心设计环节，本质上就是中高职学生综合能力差距的直观体现（B2）。

同时，资源配置的层级差距进一步放大了适配矛盾。国家与地方财政对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配置力度显著高于中职院校，中职院校在高端实训设备、专项备赛经费、骨干教师储备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统一赛事标准下，资源短板与学生能力短板形成叠加效应，导致中职选手大多止步于争夺赛，难以进入排位赛与冠军总决赛，长期的竞技劣势不仅打击中职师生参赛积极性，更弱化了中职院校参与赛事改革、对接国际标准的主动性，阻碍中高职一体化职教竞赛体系的均衡发展。

4.2.3 赛教融合政策导向与成果资源转化的落地矛盾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融”是世校赛的核心政策宗旨，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规划（2023-2027 年）》明确要求健全赛事成果转化机制，推动赛事标准、赛项资源、评价规则全面融入日常教学与产业实践，深化赛教一体、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2026年广东省出台的专项政策，进一步明确竞赛标准转教学标准、竞赛方法转实训方法、竞赛场地转实训场地的三维转化路径（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6），赛事政策重心全面从“办赛”转向“用赛”。赛事成果转化是推进赛教融合、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万军，2025）。

但调研发现，五所样本院校普遍存在“重参赛、轻转化、重成绩、轻落地”的问题，赛教融合、产赛融合仅停留在政策文本层面，赛事资源与教学、产业资源双向割裂，成果转化效能极低。其一，赛课脱节问题突出，竞赛训练体系与日常教学体系分离。受访学生表示，赛事训练的教学模式、设备配置、训练标准与日常课堂教学差异极大，课堂教学侧重基础知识点普及，赛事训练侧重精细化、高阶化技能打磨，二者资源无法互通共享（A2）。院校未将世校赛最新赛道标准、岗位技能要求、创新评价要点融入课程大纲与实训体系，赛事的产业前沿优势无法反哺教学改革。

其二，校企协同转化机制缺失，产业赋能效应不足。世校赛赛道设置坚持产业需求导向，聚焦行业前沿技术与岗位核心能力（李静波，2026），但调研显示，企业参与赛事育人、成果转化的深度不足。多数校企合作仅为挂牌共建、浅层交流，企业极少参与赛事备赛指导、课程开发、实训升级，也未将赛事创新成果、优秀技能方案落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究其原因，校企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天然偏差，院校以长期育人、公益办学为核心目标，企业以短期盈利、效益提升为核心诉求，教育的长期性与企业经营的逐利性形成冲突，导致长效协同转化机制难以建立，最终出现“赛事成果悬浮、教学改革滞后、产业赋能不足”的三重困境。

4.1.4 综合育人评价政策与赛事实操评价的导向矛盾

政策明确推动评价体系从“单一技能评价”向“德技并修、综合素养评价”转型，优化评分结构，增设创新创意、团队协作、应用价值、职业素养等评价维度，旨在全面考核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契合新时代职业教育综合育人的核心要求。政策层面明确强调，大赛坚持立足产业与生产一线实际需求，要求赛项标准、赛事规则紧密衔接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要求，推动赛事体系与产业用人标准深度适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

但在赛事实操评价过程中，传统评价惯性难以突破，综合育人的政策导向未能落地，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的重形式、轻实效、重技能、轻应用的偏差。当前赛事评分体系中，纯技能操作占比高达60%，创新创意、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各仅占10%（区绮云，2026），权重分配失衡导致赛事评价依然以技能熟练度、操作规范性、展示美观度为核心标准。尤其在文旅、烹饪、康养等文科类赛项中，赛事过度追求舞台展示效果、形式完整性与视觉美观度，弱化了成果的产

业实用性、场景适配性与落地价值，出现“表演化竞赛”的问题。

同时，评价维度缺乏进一步细化标准，主观性较强，进一步加剧评价导向偏差。政策要求应用价值需对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但实操评分中未制定具体的落地考核指标、实践验证依据等，评委难免凭主观认知打分，导致赛事成果与行业实际、岗位需求严重脱节。这种评价模式直接误导院校备赛方向，师生过度聚焦技能打磨和舞台展示，忽视成果创新、实践应用与职业素养培育，违背了世校赛综合育人、赋能产业的核心政策初衷。

4.2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落地实践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四大核心矛盾，立足世校赛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定位，结合五所职业院校实地调研的实践痛点，依托现有职教竞赛改革研究成果，从育人体系、赛制规则、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四个维度，构建“适配性、普惠性、实效性、创新性”兼具的优化路径，打通“政策—院校—课堂—产业”的落地链条，破解政策与实践的脱节难题，推动世校赛真正成为赋能职业教育改革、培育高端技能人才、对接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

4.2.1 重构普惠育人体系，破解精英化竞赛矛盾

落实国家赛事普惠育人政策要求，破除基层精英化备赛惯性，构建“全员参与、分层培育、资源共享、以点带面”的全域竞赛育人体系，实现赛事资源从“精英专属”向“全员普惠”转型。

首先，健全校级全员竞赛机制，落实湖北省“推荐队+抽测队”创新模式（湖北省教育厅，2025），取消参赛年级、成绩门槛，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校级赛事选拔赛，覆盖全年级所有学生，将校级竞赛纳入常规教学体系，作为学生技能实训的必修环节。通过常态化校级竞赛，挖掘学生技能特长与参赛兴趣，规避“少数人参赛、多数人旁观”的问题，真正落实“校校有比赛、人人可参与”的政策要求。

其次，优化赛事资源配置机制，打破优质资源垄断格局。院校可整合实训设备、经费、师资等竞赛资源，搭建全校共享平台，将赛事配套设备、训练课程、名师指导资源向全体学生开放，并融入日常实训教学（徐圣楠，2026）。改变以往资源集中供给参赛集训队的模式，通过“尖子生传帮带、名师全员授课、赛事课程常态化”的方式，让竞赛标准、前沿技能、优质资源辐射全体学生，实现“参赛选手拔尖、全体学生提质”的双重目标。同时，改革院校赛事考核评价机制，弱化赛事奖牌数量、获奖等级等功利化考核指标，将赛教融合成效、学生全员技能提升率、课程改革成果、育人质量提升等作为核心考核内容，从制度层面破除“重奖牌、轻育人”的政绩导向。

最后，构建分层育人培育体系，适配不同学段、不同能力学生的发展需求。针对低年级学生，开设赛事基础通识课程，普及世校赛赛道标准、岗位技能要求，夯实基础技能；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开展专项技能集训与创新实践培育，选拔学生组建竞赛梯队，参与省赛、国赛、世校赛逐级

竞技。通过分层培育、阶梯式成长，既保障赛事竞技水平，又实现全员育人的政策目标，化解顶层普惠政策与基层精英实践的结构性矛盾。

4.2.2 优化赛制规则设计，平衡中高职竞技公平

立足中高职分层发展、一体化育人的职教发展规律，优化世校赛赛制规则，兼顾赛事国际化标准统一性与学段发展差异性，破解中职院校天然竞技劣势，实现赛事公平与育人实效的双向统一。

首先，推行“基础分层竞技、高阶同台比拼”的差异化赛制模式，在总决赛争夺赛阶段设置中高职分组竞技赛道，结合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制定适配的评分标准与任务要求，中职侧重基础技能实操、岗位标准化操作，高职侧重技能创新、方案设计、综合应用。在排位赛、冠军总决赛阶段取消分组，实行中高职同台竞技，统一高阶创新评价标准，既保障中职学生的基础参赛公平，又保留高阶赛事的竞技性、观赏性与国际化标准属性，实现分层培育与统一引领的有机结合。

其次，加大中职院校赛事资源扶持力度，补齐层级资源短板。国家与地方教育部门需优化赛事经费、实训资源、师资培训的分配机制，加大对中职院校的专项政策倾斜，设立中职赛事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中职院校升级高端实训设备、培育骨干教师团队、对接行业前沿资源。搭建中高职赛事帮扶共建平台，推动优质高职院校与中职院校结对共建，共享赛事训练方案、课程资源、专家师资，助力中职院校提升备赛能力与教学质量。同时，优化中职赛事激励机制，增设中职专项奖项、技能创新奖项，认可中职学生的技能优势与实践成果，提升中职师生参赛积极性，破除中高职赛事发展失衡的困境。

最后，以赛事标准倒逼中高职一体化教学改革。依托世校赛差异化赛制设计，统一中高职技能培养核心标准，梳理各专业学段技能衔接要点，构建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中高职一体化技能培养体系。中职阶段聚焦基础技能标准化培育，高职阶段聚焦技能创新、综合应用与岗位适配，规避学段技能重复教学、断层脱节问题，从人才培养源头缩小中高职学生综合能力差距，逐步实现中高职赛事竞技与育人质量的均衡发展。

4.2.3 深化产赛教融合，健全成果双向转化机制

紧扣世校赛“以赛促改、以赛促用”的政策导向，落实广东省赛事成果转化专项政策要求，依托配套转化手册推行竞赛标准转教学标准、竞赛训练方式转实训方式、竞赛场地转实训场地的三项转化举措，推动世赛创新成果赋能产业发展，着力破解赛教脱节、产赛割裂的现实难题（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6）。

首先，推进赛课深度融合，实现赛事资源常态化育人。各院校需对照世校赛42个产业导向赛道标准，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与实训教学大纲，将赛事涵盖的岗位核心技能、职业素养要求、创新设计理念、行业前沿技术全面融入日常课程体系（李静波，2026）。拆解赛事评

分要点，转化为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内容，构建“基础教学+赛事拓展+创新实践”的三阶课程体系，让日常教学对标赛事标准、贴合岗位需求、对接产业前沿。同时，统一教学与赛事的实训设备、训练标准、考核模式，消除课堂教学与赛事训练的资源壁垒，实现“以赛提质、以教固赛”的良性循环。

其次，深化校企协同合作，构建长效成果转化机制。遵循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支持、社会参与的赛事办赛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由地方教育部门、行业协会牵头，搭建世校赛产教融合平台，引导头部企业深度参与赛事育人与成果转化。建立校企双向赋能机制，企业提供前沿技术、高端设备与真实项目，全程参与备赛、课程开发与教学改革；院校依托赛事成果和技能人才，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人才供给，以此化解浅层、短期合作问题，实现互利发展（徐圣楠，2026）。推动赛事创新成果落地企业生产场景，将获奖方案、技能创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工艺、服务标准，实现赛事成果从“赛场展示”向“产业应用”转型。

最后，搭建成果共享转化平台，实现资源全域流通。依托省级职教一体化平台，整合世校赛赛事标准、优秀作品、训练方案、实训资源、创新成果等建立赛事成果资源库，面向全省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开放共享。推动校校、校企之间的资源互通、经验互鉴，最大化释放赛事改革价值，让赛事成果全面赋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技能升级。

4.2.4 优化综合评价体系，锚定产业育人导向

对标世校赛综合育人、产业赋能的政策定位，重构科学化、精细化、产业化的赛事评价体系，打破重技能、重形式、轻应用、轻创新的评价惯性，实现赛事评价与人才培养、产业需求、国家战略的精准对接。

首先，优化评分权重结构，均衡综合育人维度。调整现有评分体系比例，可将技能水平评分占比从60%下调至40%，同时，同步提升应用价值、创新创意、职业素养、团队协作的评分权重，凸显综合素养与实践应用的核心地位，落实“德技并修”的育人政策要求。通过权重优化，引导师生从单纯打磨技能、追求展示效果，转向注重成果创新、实践落地、职业素养培育。

其次，细化应用价值评价标准，破除主观评分弊端。针对赛事应用价值评价相对模糊、主观性强的问题，结合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高质量就业等国家战略需求，制定量化、可落地、可验证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实用性、经济性、可持续性、创新性等维度进一步细化评分细则，要求参赛成果需提供企业落地验证报告、场景应用案例、效益提升数据等，以客观实践数据补充评委主观打分，杜绝“表演化竞赛”形式主义问题，确保赛事成果贴合产业实际、具备落地价值。

最后，建立动态评价迭代机制，适配产业发展趋势。依托行业协会、头部企业、职教专家组建评价标准研发团队，结合产业技术迭代、岗位需求更新，每年动态优化世校赛评分标准与评价

维度。推动赛事评价标准与行业职业标准、企业岗位标准、职教教学标准四维融合，让赛事评价始终贴合产业前沿，充分发挥赛事“以赛导教、以赛导产”的风向标作用，真正搭建起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精准桥梁。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落地与实践矛盾为核心议题，通过梳理2005年至今我国关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三阶段政策演进历程，结合广西、广东五所中高职职业院校的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数据，系统剖析政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落地之间的多重核心矛盾，形成以下核心研究结论。

其一，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策历经初步探索、制度建立、国际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已完成从“行政试点”到“制度定型”、从“国内比武”到“国际引领”、从“单一竞技”到“综合育人”的全方位迭代，形成了完善的三级竞赛体系与政策制度框架，政策重心从“规模化办赛”逐步转向“高质量用赛、精准化育人”，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

其二，世校赛政策落地实践中存在四大结构性核心矛盾，严重制约政策价值落地。具体表现为：顶层普惠育人政策与基层精英化备赛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化统一赛事规则与中高职分层发展的适配矛盾、赛教融合政策导向与成果资源转化不足的落地矛盾、综合育人评价政策与赛事实操评价的导向矛盾。四大矛盾相互交织、层层递进，最终导致赛事育人普惠性不足、赛教融合深度不够、成果产业赋能薄弱、赛事公平性缺失等现实困境，是当前世校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阻碍。

其三，破解世校赛政策落地与实践的矛盾，需立足“政策适配、育人为本、产业赋能、公平高效”的核心原则，从育人体系、赛制规则、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四维协同优化。通过重构普惠育人体系、差异化优化赛制规则、健全产赛教融合转化机制、完善产业化综合评价体系，能够有效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破解实践痛点，推动世校赛从“赛事竞技工具”真正转型为职业教育改革、高技能人才培育、产业升级赋能的核心载体，实现政策设计与实践成效的深度统一。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五所两广地区职业院校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微观实证分析揭示了世校赛政策落地的现实矛盾与优化路径，具备一定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参考价值。但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调研样本范围有限，仅聚焦两广地区中高职院校，未覆盖东部、中西部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职业院校，样本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研究侧重静态矛盾剖析与路径构建，对世校赛政策落

地的动态演化机制、不同区域政策执行的差异化逻辑未展开深入探讨；三是所提出的优化路径尚未经过大规模实践验证，落地适配性仍需进一步完善。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范围，覆盖全国不同区域、不同办学类型的职业院校，开展多区域、多类型的对比研究，深入剖析不同区域、不同层级院校的政策落地差异与深层成因，提炼更具普适性的实施路径。同时，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动态监测世校赛制度改革、成果转化、评价优化的实践成效，结合产业技术迭代、职教改革趋势，持续完善赛事育人体系与政策落地机制。此外，可聚焦世校赛国际化发展趋势，深入探索中外职业技能赛事融合发展、国际赛事标准本土化落地的实践路径，助力我国职业教育赛事体系走向世界、引领全球职业技能教育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安徽省教育厅. (2025).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大赛管理工作的通知（皖教秘职成〔2025〕70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 关于推动世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

湖北省教育厅. (2025). 2026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湖北省教育厅. (2025).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6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教职成函〔2025〕6号).

教育部等35部门. (202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修订版）.

教育部等37部门. (201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修订版）.

李杰,郭达,张瑞, &.陈晓曦. (2018). 以世界技能大赛推动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改革的路径探析——基于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文件的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 39(28), 22-27.

李静波,申培轩, &.耿洁. (2025). 创新赛制，全面升级，综合育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4), 5-14+61.

李静波. (2026). 技能竞赛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综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6), 5-9, 16.

刘东菊. (2012). 世界技能大赛对我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启示.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36), 48-52.

刘东菊, &.王晓辉. (2013). 世界技能大赛：标准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职业技术教育*, 34(21), 34-38.

刘东菊. (2016). 参与世界技能大赛，提升技能人才培训质量.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5), 59-62.

区绮云. (2026). 基于评分标准解析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制胜策略研究. *卫生职业教育*, 44(8), 157-160.

深圳市教育局. (2008). 关于参加200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深教〔2008〕86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6).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发〔2006〕24号).

万军. (2025). 赛教融合视域下世界技能大赛项目成果转化路径研究——以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视角.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1), 136-139.

吴少森, &.徐燕铭. (2026).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职业标准衔接的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产教融合视角. *现代职业教育*, (8), 1-4.

徐圣楠. (2026). 高职以赛促教推动人人成才与拔尖创新的竞赛实践.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39(7), 86-89.

徐梓榆, &.吴书龙. (2025).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反哺教学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汽车维护与修理*, (10), 110-112.

曾天山,房风文,陈宏辉,&.刘晓辉. (2024). 以高水平赛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8), 18-28.

张宏亮. (2011).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热背后的冷思考.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13(2), 56-59.

张俊勇, &.张玉梅. (2018). 世界技能大赛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 39(27), 47-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 国家职教改革试验区第二次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8). 教育部关于举办200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教职成函〔2008〕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 教育部2009年第10次新闻发布会介绍200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3).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2013-2015年）》的通知（教职成函〔201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教育部关于举办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的通知（教职成函〔2020〕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规划（2023—202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4). 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4). 教育部关于印发《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函〔2024〕5号).

周济. (2008, 6 月 29 日).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开幕式上讲话. *中国教育报*.

周衍安. (2021). 世界技能大赛对职业教育人才评价的启示——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赵志群教授. *职教论坛*, 37(7), 45-52.

作者简介

刘畅，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

冯慧媛，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

黄妍，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

胡奕婷，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